

灯下漫笔

史海钩沉

墓碑上的史记

◆ 杨娥

微雨清明。走进伏牛山怀抱，层峦叠翠，故乡在春色朦胧中洒染。

在民族根脉的传承中，有两场盛大的祭祀，一场是清明春祭，另一场是寒食秋祀。今天，奔赴一场英雄崇拜的春祭。

人一定是有灵魂的。踏着清明的芳草，至鲁山县赵村镇南岗拜祭赵旌、赵相两位民族英雄。五百年不朽。梨花掩映下的墓志铭铭刻侠士平生事迹：“勋烈震叠，声名洋溢。”

赵旌，鲁山县赵村镇赵村人，明朝嘉靖年间武举人。生年不详，卒于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赵旌年少好学，文武双全，“性刚毅，善骑射”，为人慷慨，轻财重义，崇廉尚武，除恶扬善，好为人打抱不平。嘉靖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公元1547-1549年），倭寇侵江浙闽地区，朝廷徵文招募骁勇。赵旌率团练300余人，与胞弟赵相应召，赴江南沿海抗击倭寇，以武举出身奔赴抗倭前线，成为北方乡勇南调抗倭的典范，是河南武将在江南抗倭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赵相，赵旌胞弟，生卒不详，一生追随胞兄赵旌抗击流寇，保家卫国。

穿过500年古战场，裹挟着历史的尘烟，铁马冰河铮铮，刀枪剑戟锵锵，英雄的记忆里从未抹去战争风云的高度警惕。身披铠甲，头枕青山，墓碑上的亮光照耀着他们史诗歌的传奇。

都说燕赵之地多慷慨悲壮之士，然楚之北鄙亦不乏仗义赴国之侠客。把时间拉回大明王朝的疆域，在无尽的遐想与揣测中和两位侠士不期而遇，和他们的勇气，和他们的精神，和他们保家卫国的忠烈肝胆不期而遇。

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夏，倭寇肆虐江浙闽沿海地区，绍兴府境内曾任过三朝大学士谢迁的庄园也被抢劫一空。有御史上奏，整个东南沿海地区的倭患已经失去控制，建议派遣一员有权自主行事的高级官员到沿海地区，根除倭患，安邦救民。

于是，大明朝廷委派右副都御史朱纨为提督，守备闽浙海防军务，巡抚浙江，抵御倭寇。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聪明干练、臂力过人、武功精湛、轻财重义、富有血性的鲁山赵村人赵旌、赵相兄弟，急国难所急，召之即赴，亲自挑选武艺高强的精壮汉子，率领300多名铁血乡勇，应召奔赴江苏淮安抗击倭寇。

万里赴戎机。湿热的江南之夏，300勇士出乡关，渡长江，千里跋涉奔赴国难。一轮孤月越过云雾与山巅，刺破古战场深藏夜幕，从河南鲁山赵村出发至江苏淮安，身披长剑的中原勇士辗转江南烟雨，兑换一腔英雄侠气。

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48年）初，赵旌率领乡勇到达江苏淮安，正值倭寇进犯江苏，战事吃紧，来不及休整，赵旌立即率部迎敌，他身先士卒，利剑在月光下闪着寒光，奋力杀敌10余人，其部属也奋不顾身，一举将敌击溃，顽寇突围勇士，惊慌逃遁。赵旌因为忠勇受到嘉奖，初战告捷，又受到嘉奖，乡勇团队不断壮大，士气高涨。

淮安当时为漕运枢纽，商旅繁荣，倭寇屡犯。赵旌部属的乡勇属“南阳营”，归属漕运总督巡抚节制。在战争间隙，赵旌身先士卒操练武艺，不断提高杀敌本领。他清楚地知道面对的是来自东瀛的倭寇强敌，他告诫官兵，倭贼不比豫西流寇，要戒骄戒躁，提高自身战斗力和团队凝聚力，做到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朱纨到任后，采纳当地士民的建议，革渡船，严保甲，搜捕通倭奸民，整顿海防，严禁商民下海，派遣都司卢铨率领福清兵由海门进兵，攻克倭寇巢穴双屿港，与赵旌联袂作战，活捉日本人船天和海盜许栋等，并筑塞双屿，堵击倭寇，将捕获的通倭罪犯一律处死。

嘉靖二十八年（公元1549年）4月19日，倭寇数千人再次进犯通州，如皋一带，赵旌一边派人飞速上报，一边积极部署出击。不待大军会合，即与其弟赵相抓住战机，进击倭寇。赵旌骁勇善战，一马当先，连杀敌数敌，迅速提高了士气。弟弟赵相身负重伤，仍浴血奋战。战马嘶鸣，剑戟叮当，所部300多名壮士，慷慨戮战，以一当十，杀得倭寇惊慌逃遁。赵旌率部穷追不舍，且战且勇，直至如皋印庄、新沙洲、新河口，又斩敌800多人，俘敌枭首，大获全胜。巡抚淮阳御史李合嘉其忠勇，奖励冠带犒赏，并拨给马步兵500名，开拔到泰兴黄桥驻守。

这一仗，杀出了朝廷的威风，战出了兵勇的果敢，展示了赵旌兄弟忠勇报国的大仁大爱、大智大勇。朝廷授予嘉靖南阳汝州御右所百户加指挥衔。赵旌、赵相踩着江南的月辉，湿漉漉的石板路皎洁成弟兄二人英勇豪放的生命光华。

戎马倥偬。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赵旌因病获准回老家疗养，他把自己的刀剑封存于江南记忆，伏牛山的斜阳铺满了岁月的惋惜。第二年，赵旌去世。他的好友，时任山西道监察御史余姚进士宋勺，为其撰写碑文：“赵君鲁阳义士，孝以承家，义以应世，威平倭寇，功在社稷。气摄寰蒙，德被闻里。”好一个“功在社稷”！这是对一介平民赵旌最中肯、最崇高的评价，他们多次响应朝廷号召，开民间抗倭之先例，为后世抗击外寇侵略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山花滴露，松柏苍苍，赵旌兄弟的墓碑铭文浸润着一股英雄气，是滋润，是抚慰，他们的名字越来越响亮，超越500年时光，照亮了人类和平的征程。

沙河汤汤，一场迟到的拜谒，隔着清明的雨和风，有了心灵感应。那股英雄气依然在拔节、灌浆，在蓬勃地生长着。

元封元年春天，汉武帝刘彻站在嵩山太室山巅，向北望见泰山，向西望见华山，向南望见桐柏山，向东望见太行山。黄河如带，洛水如环，中原大地尽收眼底。这一年他47岁，已经做了29年皇帝，将汉朝疆域拓展到前所未有的广度。此刻，他思考着一个帝王最终的叩问——如何与天神对话，如何让江山永固。封禅是他的答案。但在泰山之前，他必须先上嵩山。

古人相信，嵩山是“天地之中”。周公在此测日影定地中，认为这是天下最中心的地方。秦始皇封禅泰山，继承的是周朝旧制；汉武帝先祭嵩山，自有更深的政治考量——他要告诉天下，汉朝承继的是三代正统，而嵩山就是这正统的地理象征。

祭祀在嵩岳庙举行。正当仪式进行时，奇异的事发生了——太室山一座山峰突然传来三声高呼：“万岁！万岁！万岁！”声音在山谷回荡，久久不息。方士们立刻跪倒：“陛下，这是嵩山山神在向您致意！”汉武帝大喜，当即封嵩山山神为“天室”，并将此峰命名为“万岁峰”。并在峰上建“万岁亭”，峰下建“万岁观”（后演变为崇福宫）。同时划山下300户居民设立“崇高县”，免除赋税徭役，专司祭祀中岳山神。

这个故事被司马迁写进《史记》。无论太史公对方士那一套多么不以为然，他如实记载了。从此，嵩山与“万岁”结下不解之缘。1800年后乾隆来此，写下了“嵩呼万岁自当年”的诗句。

站在山巅那一刻，汉武帝心中涌起怎样的豪情？《资治通鉴》记载，他曾对随行官员说：“朕闻三代之王，皆在中土。今嵩山之下，天地之中

也。朕欲建都于此，如何？”群臣纷纷劝阻。汉武帝笑了笑，不再提起。但他这句话透露出的信息是——在他心中，嵩山“天地之中”的地位何等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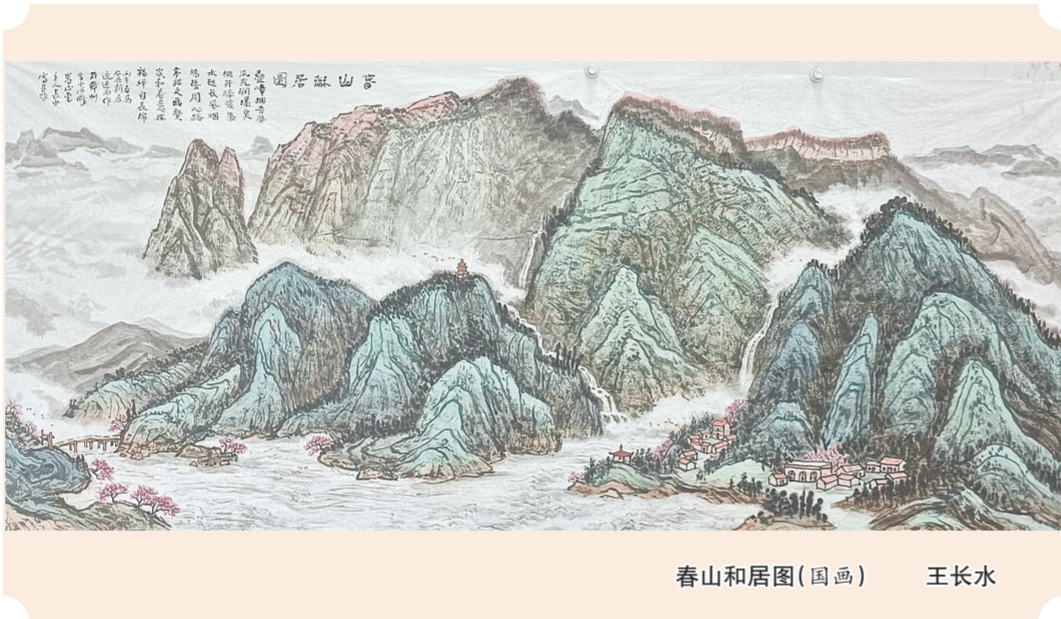
汉武帝一生只来过嵩山这一次。但这一次，就足以让他确信自己确实是天命所归的真龙天子。汉武帝祭祀嵩山，对“天地之中”地位的确立，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在他之前，嵩山是《禹贡》中的“中岳”，地位并不突出。秦始皇封禅泰山，对嵩山只是“望祀”。汉初诸帝忙于恢复经济，无暇顾及。直到汉武帝，嵩山的地位才真正提升。

古人观念里，帝王必须居于“天下之中”，才能承天命、治万民。夏商周三代都城都在黄河中游，被认为是“天地之中”。秦朝建都咸阳偏居西方，被儒家认为不得正统。汉朝建都长安，同样面临这个问题。汉武帝祭祀嵩山，正是在宣告——汉朝承继三代正统，嵩山就是明证。

这种观念影响深远。后世王朝无论都长安、洛阳还是北京，都要强调自己“居天下之中”。武则天定都洛阳，改嵩山为“神岳”；明清皇帝仍要说“天子居中国之中”——这是一种政治修辞，更是一种文化认同。

从家族层面，汉武帝要为刘氏皇族寻找合法性。他的曾祖刘邦以布衣取天下，凭什么代秦而立？祖母窦太后信奉黄老，母亲王娡出身平民，皇后卫子夫曾是歌女——这个家族的权力之路始终伴随着“合法性”的质疑。他需要用封禅向天下宣告：刘氏皇族受命于天。嵩山那三声“万岁”，正是他渴望的上天背书。



春山和居图(国画) 王长水

荐书架

《过江梦》：为读懂民国打开一扇独特窗口

◆ 陈悦

近日，张伯驹长篇小说《过江梦》新书发布会在北京举行。这部在抗战烽火中落笔，以“天马居士”为笔名连载于1944年西安《正报》的作品，尘封80年后，终于以全新姿态与读者见面。

张伯驹（1898-1982），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者，被誉为“天下民间收藏第一人”。著有《丛碧词》《春游图》等；晚年自创“鸟羽”体书法；与梅兰芳、余叔岩等交往密切，编写《近代京剧》推动京剧研究，并组织“国剧学会”。他一生致力于收藏和保护中国书画文物，其收藏包括西晋陆机的《平复帖》、隋朝展子虔的《游春图》等顶级国宝。1952年起，他陆续将毕生收藏的117件珍贵文物无偿捐赠给国家，其中仅故宫博物院就接收了8件顶级书画，这些捐赠占故宫顶级书画收藏的近一半，因此有“一人撑起故宫书画半壁江山”之说。他秉持“但使国宝永存吾土”的信念，甚至在1941年被绑架时，宁死也不愿用藏品换命。张伯驹

读金国强的《河边》，如将手探入黄河的潺潺水流，触及了河床深处那些温润而厚重的文明沉积。这部41万字的作品，分上下两部，十个章节，是作者以十余年光阴，在黄河下游豫北滩区这片土地上完成的深情“打捞”。与其说它是一部自传体文学著作，不如说是一次系统的“岸上考古”，一次向着文明源头的溯源之行。

然而，金国强的考古，用的不是洛阳铲，而是一双在冬夜的火堆旁冻僵的手，和一只随时掏出手机记录的手指。

他告诉我，他在老家赵厂长大。这个村子距黄河十里，村里的地却一直延伸到黄河滩里，与河水顶头相接。赵厂的名字，从明朝起家设场打麦的“赵家场”，到“赵家厂”，再到省掉“家”字的“赵厂”，三个字的变迁，就是一部中原村庄的微缩史。麦收之后磨豆时，天热得人喘不过气，在地里干完活，“衣裳一脱，呼腾就跳河里了”。黄河水哪里浅、哪里深、哪里急、哪里有漩涡，他从小泡在水里，对这些一清二楚。有漩涡的地方不敢去，“跳里头旋是一旋一旋就给你旋到河底了”。这种与河水肌肤相亲的体感，这种用身体丈量过的危险与日常，是任何“采风”都无法获得的。

正因如此，《河边》的写作从一开始就呈现一种罕见的质地：它不是外来者的田野调查，而是归乡者的生命回望。金国强没有专门“采访”过谁，因为他就生活在这个圈子里。从小听母亲讲故事，听邻居“溜曲儿”，听亲戚说谚语，这些声音长进了他的身体，四十多年后，又从他的

晚年生活俭朴，居无定所，蜗居10平方米小屋，但始终坦然面对困境。1982年病逝于北京。

这部小说以张伯驹与潘素在上海的爱情传奇为主线，穿插了他与北京文人雅士的交往故事，还详细记录了他40岁生日时为家乡河南筹集善款，与余叔岩、杨小楼等京剧大师合演《空城计》的盛况，同时也完整记录了“七七事变”等史实。

张伯驹作为中国近现代集书画家、收藏家、鉴赏家于一身的文化大家，《过江梦》的发掘与整理兼具重要学术价值与文化意义：作为其唯一现存自传性文学作品，书中不仅为研究其生平轨迹、思想演变提供了鲜活的第一手资料，更以个人视角细腻折射出民国时期尤其是抗战背景下文化界的生存境遇与精神坚守，融史料价值与艺术价值于一炉。这部作品的出版，为读者走近张伯驹、读懂民国社会打开了一扇独特的窗口，也为近代文学史、文化史研究补充了珍贵的实物文献。

书人书话

文明的河畔

◆ 张舒娜

笔端流出来。近十年来，他更加用心：冬夜农村烤火，谁说不冷，他赶紧记到手机上；酒桌上谁说敬个歌后语、顺口溜，他立刻记下来。这种近乎执拗的“打捞”，使《河边》成为一部由无数具体生命经验浇筑而成的作品。

人类文明的曙光，总是最先照亮大河的沿岸。古埃及的尼罗河，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两河，古印度的印度河，以及中国的黄河，无一不是孕育伟大文明的摇篮。《河边》的笔触，便牢牢锚定在黄河下游豫北滩区这一方水土。但金国强的目光，并非投向宏大叙事中的文明，而是谦卑地、专注地凝视构成文明最基本单元的日常生活：村庄的肌理、农事的节律、邻里的伦理、口耳间的故事。在他笔下，文明的河畔首先是无数具体生命劳作、欢欣、歌唱的岸岸。

尤为可贵的是《河边》抵达这一深度的方式。金国强将自己彻底置身于那“伟大的生活”之中，其叙述呈现一种质朴从文式的乡土笔法之醇厚，与曹芹式文字质感之精微。他自如地融合豫北方言、民间谣谚与生活俚语，使文本既保留了乡土语言扑面而来的鲜活劲道与泥土气息，又通过文学化的提炼，追求并实现了文字的

但他还有更深的追问。47岁的他开始思考终极问题——如何让江山永固？如何让自己不朽？他的一生都在征服，但征服者终将被时间征服。他开始痴迷神仙方术，派人入海求蓬莱，炼丹以求长生。封禅，正是沟通天人的最高仪式。他要在嵩山这个“天地之中”，祈求国祚永延，也祈求自己超越生死。

然而历史充满反讽。这个在嵩山上宣告天命所归的帝王，晚年却陷入深深的怀疑。巫蛊之祸中，他逼死太子刘据，事后建思子宫追悔莫及；他追求长生不老，最终却在轮台罪己诏中承认自己“狂悖”。当他再次望向嵩山方向，那三声“万岁”的回响，是否变成了对他的嘲讽？

这就是人性的复杂，也是权力的悖论。站在天地之中的人，往往最容易迷失自己。

嵩阳观内有三棵古柏，相传周代所植，已有上千年历史。汉武帝来到嵩阳观，一进门就被第一棵柏树惊呆了——树干粗大，七八人才能合抱，枝叶遮天蔽日。他仰头赞叹：“真乃大将军也！”

继续前行，第二棵柏树比刚才那棵还要粗大，树身扭曲如龙，树冠覆盖半亩。汉武帝有些尴尬，但金口玉言不能改，他指着第二棵说：“你是二将军。”

再往前走，第三棵柏树比前两棵还要大。他更尴尬了，只能硬着头皮说：“你是三将军。”

从此三棵柏树有了名字。民间有谚语：“大将军不如二将军，二将军不如三将军。”

这只是一个传说，却反映了汉武帝在民间的形象——既有帝王威严，又有凡人幽默。他不像秦始皇那样冷酷无情，也不像武则天那样充满政

知味

豫东皖北的胡辣汤

◆ 孔留根

说起河南胡辣汤，第一印象是浓烈厚重、色泽褐红，胡椒与香料冲撞出霸道的辛香，入口浓郁。可偏在兰考，却有一种清雅别致的存在，它便是兰考白胡辣汤。

白胡辣汤跳出了浓色厚重的窠臼，不施红油，不着酱色，以手工洗面筋的原浆熬出乳白汤汁，筋爽口筋道，以上海带、粉皮几样素料，加上白胡椒粉，增一缕温辛，辣而不烈，盛到碗里，再点几滴白醋和小磨香油，酸爽中透着郁香，汤液中藏着筋骨，朴素里透着纯粹，在万千胡辣汤里自成一格，守着黄河故道独一份的温润本真。

喝过兰考白胡辣汤，再尝安徽宿州的辣汤，舌尖最先感受到的，是惊人的相似。一样以手工洗面筋为骨，以面浆勾芡为魂，一样靠白胡椒暖身醒胃，一样是清晨街头最熨帖人心的烟火。一碗乳白清亮，一碗醇润鲜香，细微处虽有不同，骨子里却是同根同源的血脉。这般惊人的相似，绝非巧合，而是一段跨越百年、牵起豫东皖北的往事，藏着两地人滋味相通、命运相连的深情厚谊。

故事要从宣统元年，即1909年说起。

当年，津浦铁路南宿州站动工兴建，大批劳工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其中就有一支施工队伍来自兰封，也就是今天的兰考。

兰封劳工队伍里跟着一位专司伙食的厨师，他一手兰考白胡辣汤做得地地道道。工地上风大天寒，劳作辛苦，他便支起大锅，按家乡传统方法揉面洗面筋，熬出乳白浓汤，撒上白胡椒，配上海带粉皮，便成为地道的兰考白胡辣汤。一碗下肚，浑身暖意升腾，成为兰封劳工赶走疲劳、慰藉乡愁的最爱。

胡辣汤的香气飘出工地，很快便引起本地居民的好奇，再看到劳工喝汤时那满足幸福的神态，他们更感神奇。于是，很多宿州百姓纷纷赶来尝鲜，兰封人也不吝惜，大方送上一碗，并极力推荐家乡的美食。淳朴的宿州人一喝便爱上这口醇厚热辣，兰封工匠与厨

师也不藏私，把洗面筋、控火候、调胡椒的诀窍一一相传。宿州人又依本地口味，慢慢加入黄花菜、木耳、豆皮等食材，让汤味更丰富适口。就这样，兰考白胡辣汤在皖北水土滋养下，渐渐衍化成独具风味的宿州辣汤，从工地灶台逐渐走进街市井，成为当地人割舍不下的早点记忆。

两年后，南宿州火车站完工，兰封劳工返乡离去，可这碗汤却永久留了下来，成为两地最早的味觉纽带。

时光走到1960年代，位于黄河故道的兰考，风沙、盐碱、内涝三害频发，百姓生活艰难，不少人拖家带口，沿着当年修铁路的路线，一路逃荒来到宿州。彼时宿州也不算富裕，但宿州的乡亲们也没有吝惜，他们尽己所能拿出食物，招待饥肠辘辘的兰考百姓。街头辣汤铺更是主动盛上热汤，分文不取。一碗碗滚烫的辣汤，暖了逃荒人的身，更安了逃荒人的心。兰考人也不忘本，把正宗白胡辣汤的老手艺再次细细传授，两地百姓在患难中相互帮衬、彼此照应，昔日的滋味之交，升华为患难与共的乡土真情。

一碗汤从兰考传到宿州，是手艺的交流；一碗汤从苦难走上幸福，是人心的相守。相似的汤色，相通的暖意，相连的岁月，让兰考与宿州超越了地域界限。

宿州，这个现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名字，却在两代兰考人心中留下了抹不去的印记。它不是地图上的一处固定的坐标，而是一段岁月凝成的共同记忆，是一碗热汤牵起的两地情深，是苦日子日子里彼此伸手相扶的温暖故事。

对兰考人而言，南宿州是他乡，亦是故乡；是路途尽头的落脚处，是风雨之中的避风港。时光可以抹去一个旧地名，却抹不去刻在味蕾上的乡愁，忘不了患难与共的恩情。那一碗从兰考飘来的辣汤，在宿州的烟火里落地生根，也把两地人的血脉情谊熬得绵长醇厚，岁岁年年不曾淡去。

一个又一个村落，在雪夜兼程里叩问变迁中的乡野。这时的写作，升华为一种带着文化自觉与紧迫感“田野抢救”。他像一个坚定的守护者，试图用脚步丈量、用文字挽留那些正随现代化波涛迅速消逝的生活样态与文化段落。当推土机与信息流席卷一切，这样的记录便拥有了碑石般的价值。它守护的，不仅是一种怀旧的情调，更是我们民族赖以识别自我、确认来路的文化密码与精神根基。

因此，《河边》最终成就的，是一部关于黄河文明的“微观史诗”与“活态档案”。金国强用60年的岸上生活与十余年的案头耕耘，向我们揭示了一个朴素真理：最伟大的文明从来不是抽象的概念悬浮于空，它恰恰具体而微地存在于每一次走访的礼仪中，凝结在每一个即将失传的方言词汇里，回荡在每一首口耳相传的童谣间。他对脚下这片土地“爱得深沉”的赤子之情，全然化作了为文明存照、为河畔立碑的自觉担当。

最终，这条“文明的河畔”在书中成为一个意蕴丰厚的象征。它既是地理的故乡，也是精神的归处；既见证了文明古老的肇始与延续，也承载着当代最剧烈的转型与阵痛。《河边》以其厚重的体量、深情的笔触与复合的价值，在文学与现实之间，为我们立起了一块温润而坚实的文化界碑。它提醒所有奔涌向前的人们，在奔赴浩渺未来之时，不应忘记自己从哪一片深情的河畔启航。只要黄河还在流淌，这片由无数个体记忆与集体经验夯实的坚实岸线，将永远是

我们汲取力量、确认身份的故乡。